

女性议价能力与家庭储蓄行为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研究

邹薇 尹文玺*

内容提要 高储蓄率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2010–2020年中国国民储蓄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而同期女性议价能力则出现上升趋势。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女性议价能力与家庭储蓄行为的理论模型，从家庭内部权力分布的视角分析中国国民储蓄率下降的原因。本文使用2011–2019年五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女性议价能力的提升显著降低了家庭储蓄规模。女性议价能力作用于家庭储蓄行为的机制包括教育支出、社会网络以及移动支付。本文结论丰富了女性议价能力影响家庭储蓄决策的理论框架，提供了探讨国民储蓄率变化和制定关注家庭内部不平等、建立扩大内需长效机制公共政策的微观机制和证据支持。

关键词 家庭内部不平等 女性议价能力 家庭储蓄行为

一 引言

储蓄与消费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2000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国民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国民储蓄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约38%上升至2008年的51.8%。尽管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刺激消费，但2021年中国国民储蓄率为46%，仍远高于其他经济体（见图1）。高储蓄

* 邹薇（通讯作者），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电子邮箱：zouwei@whu.edu.cn；尹文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电子邮箱：whisper_Yin@163.com。本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批准号：20&ZD16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71973102）的支持。

率与低消费率是中国经济的核心特征 (Yang et al., 2011)。储蓄率过高会造成内需不足,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新时代下,如何进一步有效释放消费潜力,引导居民做出最优的储蓄决策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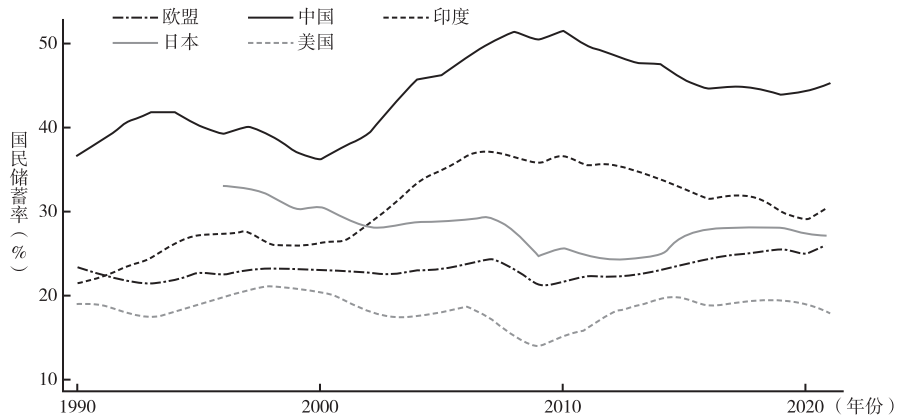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国民储蓄率 (1990 - 2021 年)

注: 国民储蓄率 = 国民总储蓄 ÷ 国民可支配收入 × 100%。

资料来源: 根据万得 (Wind) - 世界银行数据计算得到。

随着越来越多社会实践和文献探讨妇女在促进社会福利方面的作用和贡献,人们逐渐认识到妇女在家庭内决策的偏好和影响力会影响经济产出。从微观层面上,居民的消费、储蓄行为是家庭内部决策。传统观念中,一方面女性倾向于降低家庭储蓄将更多的家庭资源用于家庭基本需求和子女教育投入。另一方面,女性的风险偏好程度较低而更倾向于储蓄。因此,性别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个人偏好差异和家庭内部的议价能力影响经济决策 (Doss, 2006)。家庭经济决策的性别差异会影响宏观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总储蓄或总消费 (Stotsky, 2006)。由图 1 可以看出,虽然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国民储蓄率始终处于高位,但在 2010 年后呈现明显下降趋势,而同时期女性议价能力呈上升趋势 (见图 2)。那么女性议价能力的提升是否可以解释中国储蓄率下降的事实呢?

本文利用 2011 - 2019 年共 5 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 数据,从微观家庭层面研究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规模的影响。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在以下方面进行了拓展。首先,本文使用较新的研究视角,将家庭内部权力不平等作为切入点,为家庭集体决策模型提供了中国的经验证据,同时也为基于性别行为差异研究宏观经济的影响因素提供了参考依据。其次,本文在研究内容上进行了扩展。多数研究仅从宏观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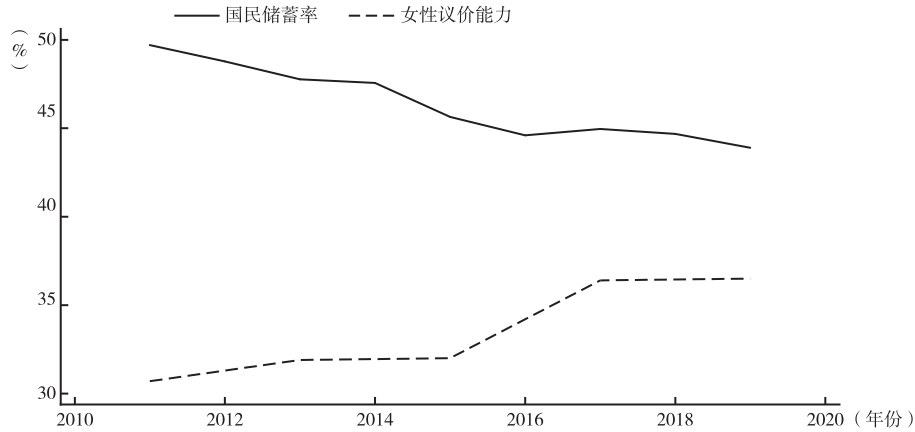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国民储蓄率与女性议价能力 (2011-2019年)

注：国民储蓄率 = 国民总储蓄 ÷ 国民可支配收入 × 100%；女性议价能力定义为妻子收入占夫妻总收入的比重 (%)。

资料来源：根据万得 (Wind) - 世界银行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 数据计算得到。

度研究女性议价能力对储蓄率的影响，鲜有学者从微观家庭层面研究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决策的影响。现有研究关于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的影响机制尚不清晰，本文丰富了女性议价能力影响家庭储蓄决策的理论框架。最后，本文选择社区其他家庭女性议价能力的均值作为女性议价能力的工具变量，有效缓解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提高了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为：第二部分梳理相关文献；第三部分是理论模型；第四部分是实证模型设定与相关变量解释说明；第五部分是实证分析结果，包括内生性考量、稳健性检验以及异质性分析；第六部分是机制分析；最后是结论与对策。

二 文献综述

(一) 衡量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文献

现有研究通常将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及社会地位指标作为议价能力的代理变量，如相对收入 (齐良书, 2005)、带入婚姻的资产份额 (Doss, 2006)、特殊项目转移给女性的现金 (如针对女性的小额信贷)、职业类别 (Cohen, 1998) 等。首先，增加经济资源可以显著改善女性的经济地位、提高女性的议价能力，进而影响家庭内部决策的性别结构。其次，家庭内部的议价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社会文化因素和政策制度

的影响。Kritz & Makinwa-Adebusoye (1999) 在对尼日利亚的研究中发现, 与来自卡努里族的妇女相比, 来自约鲁巴族和伊博族的妇女享有更大的决策权。Calvi (2020) 使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印度继承法修正案》这一外生冲击对女性营养健康的影响。该修正案通过赋予女儿继承其出生家庭财产的权利, 使女儿拥有和儿子相等的继承权, 这无疑加强了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议价能力。研究结果发现修正案施行后女性的身体质量指数 (BMI) 和贫血情况均有所改善。第三, 将女性在家庭重大决策上的话语权作为议价能力的代理变量 (殷浩栋等, 2018; Booyesen & Guvuriro, 2021)。已有文献一般使用多个决策指标, 但多种指标共同使用并不能反映家庭议价能力, 其中一些指标的准确性受到质疑。Doepke & Tertilt (2019) 的研究表明, 由于性别歧视, 女性在儿童上的支出有更强的偏好。第四, 性别比例。性别比 (定义为人口中男性与女性的人数之比) 反映的是婚姻市场中男性和女性的相对供给, 女性数量相对稀缺使家庭权力向有利于女性的方向转移 (Becker, 1981)。其他指标诸如受教育程度 (宁满秀、罗晴, 2015)、家庭暴力 (Bhagowalia et al., 2010)、第一个孩子的性别 (Li & Wu, 2011)、外貌吸引力 (王群勇、赵玮, 2019; Esping-Andersen & Schmitt, 2020) 以及参与社会活动 (陈银娥等, 2015) 等也用于衡量议价能力。

有关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研究表明衡量女性议价能力有多种角度。但女性议价能力是一个多维度、多侧面的动态变量, 难以精确衡量 (徐安琪, 2005)。因此, 在选择女性议价指标时, 要充分考虑研究目的, 并解决指标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减少模型偏差。

(二) 家庭储蓄行为相关文献

已有文献对家庭储蓄行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Keynes (1936) 首先讨论并确定了八种不同的储蓄动机, 大多数动机已被纳入生命周期理论。早期的生命周期理论将养老动机解释为主要的储蓄动机: 个人在工作时储蓄以平滑退休时消费。随着研究的深入, 生命周期理论开始向其他储蓄动机扩展, 其中最突出的是预防性储蓄动机。预防性储蓄可以解释大部分个人和整体财富积累 (Gourinchas & Parker, 2002; Skinner, 1988)。除了个体或家庭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有不同的储蓄动机, 在不同特征群体间储蓄动机也存在较大差异。Xiao & Noring (1994) 探讨了消费者的储蓄动机与家庭资产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低收入消费者更多为日常开支存钱, 中等收入群体更多为紧急情况存钱, 而高收入群体更多为财富增长存钱。

国内外学者还从金融素养、人口结构、收入差距、房价、性别差异等角度研究家庭储蓄。Lusardi (2008) 的研究解释了金融素养对家庭储蓄决策的重要性, 并认为储蓄决策不仅源于终身预算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 也受到金融素养和信息量的限制。在

人口结构层面，性别比失衡会带来竞争性储蓄，使有儿子的父母积累更多的储蓄以应对婚姻市场上男性择偶的激烈竞争（Wei & Zhang, 2011）。流动性约束的增强以及收入差距的扩大也是高储蓄率的诱因（甘犁等，2018）。房价上涨同样会扭曲居民的储蓄行为（陈彦斌、邱哲圣，2011）。此外，制度与政治环境也会影响储蓄。预防性储蓄动机使收入和经济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较高的国家拥有更高的家庭储蓄率（Börsch-Supan & Lusardi, 2003）。从性别差异的视角，Browning（2000）的研究发现由于女性相比男性更长寿，妻子更倾向于为养老储蓄。此外，女性相对男性有更强的遗赠动机和代际利他主义，这使她们更有可能为后代存钱（Seguino & Floro, 2003）。由于男性的平均收入高于女性，也有文献从收入与储蓄高度相关的角度认为男性的储蓄动机更强（Browning & Lusardi, 1996）。从女性特征角度，尹志超和张诚（2019）的研究发现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消费水平没有显著影响，但通过显著提高家庭收入正向影响家庭储蓄。相对于丈夫，妻子的工作收入对家庭储蓄率有更大的正向影响。女性收入高的家庭储蓄率较高、消费支出较低（Apps & Rees, 2001）。根据家庭资源配置理论，Seguino & Floro（2003）的研究表明女性在家庭中拥有更大决策权会提高总储蓄率。但另一方面，Gibson et al.（2006）发现女性更强的议价能力（以女性的年龄、教育程度和继承期望衡量）与较低的家庭储蓄有关。Browning（1995）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果：当女性收入更高时家庭储蓄率会下降。

家庭储蓄领域的研究不胜枚举，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归纳总结，本文认为现有研究有以下不足。从研究视角上，国内很少有学者从家庭内部不平等的角度解释家庭内部决策行为，缺乏对家庭储蓄行为的研究。事实上，家庭内部不平等极有可能通过影响夫妻间的相对议价能力影响储蓄决策。从研究内容上，多数研究仅从宏观角度研究女性议价能力对国家整体储蓄率的影响，而微观家庭层面的研究较少。已有的研究中，首先，不同国家女性议价能力对储蓄率的影响并不一致。其次，鲜有文献关注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的影响机制。结合中国内需不足、储蓄率较高的背景，研究夫妻相对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规模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 理论模型

本文的理论模型基于 Browning（2000）提出的两期家庭储蓄决策模型，该模型从“女性比男性长寿”以及“妻子比丈夫年轻”两个特征事实对单一模型进行了改进，认为妻子和丈夫存在不同的储蓄偏好。该模型有 5 个基本假设。第一，存在一

个包括妻子 w 和丈夫 h 两名成员的家庭；存在两个时期：时期 1 和时期 2。妻子将存活至时期 2 结束，而丈夫在时期 1 结束后的生存概率等于 λ ($0 < \lambda < 1$)，这是模型中唯一的不确定性来源。第二， C_t 是时期 t ($t = 1, 2$) 公共品的消费。考虑了生存概率后，丈夫在时期 2 的公共品消费存在折现因子 λ 。二人的效用函数分别为 $u_h = u(C_1) + \lambda u(C_2)$ 和 $u_w = u(C_1) + u(C_2)$ 。第三，在时期 1，丈夫与妻子的收入分别为 Y_h 和 Y_w ， $Y = Y_w + Y_h$ 是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 ρ 表示妻子在家庭收入中的份额。第四，时期 2 的家庭收入为时期 1 的储蓄。假设实际利率为零，因此时期 2 的预算约束为 $C_2 = Y - C_1$ 。第五， P 和 S 分别表示为丈夫 h 和妻子 w 的储蓄决策。二人的效用函数可以进一步表示为：

$$\max_P u(Y - P - S) + \lambda u(P + S), \quad 0 \leq P \leq (1 - \rho)Y \quad (1)$$

$$\max_S u(Y - P - S) + u(P + S), \quad 0 \leq S \leq \rho Y \quad (2)$$

基于上述假设，妻子的储蓄函数可以表示为^①：

$$S(P) = \max[\min(\rho Y, 0.5Y - P), 0] \quad (3)$$

而丈夫的储蓄函数表示为：

$$P(S) = \max[\min((1 - \rho)Y, \pi Y - S), 0] \quad (4)$$

在传统的单一模型中，由于存在“收入池”假设，贴现因子与储蓄决策独立于家庭收入分配。Browning (2000) 的两期模型放宽了收入池假定，模型中丈夫和妻子用当前收入为当前（公共）消费或储蓄做出贡献。给定任意 $(\rho, \lambda, u(\cdot))$ ，在 (P, S) 处存在唯一的纳什均衡，且这种非合作博弈的结果是帕累托有效的，每个帕累托有效的结果都可以通过某种收入分配进行合理化。

最终，家庭的总储蓄规模可以表示为：

$$total_saving = \rho \hat{S} + (1 - \rho) \hat{P} \quad (5)$$

其中， ρ ($0 \leq \rho \leq 1$) 表示妻子在家庭总收入中的份额，代表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议价能力，丈夫的议价能力表示为 $1 - \rho$ 。因此由式 (5) 可以看出，家庭总体储蓄规模不仅受到家庭总收入的影响，也同时受到女性议价能力的影响。 ρ 越大，女性在家庭中的话语权越大。当 $\rho = 1$ 时，即妻子在家庭中是独裁者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家庭将完全按照妻子的偏好储蓄。

① 假设妻子为独裁者时，家庭每期消费量设置为 $0.5Y$ ； π 为当丈夫为独裁者时其效用最大化下所选择的储蓄率，通常 $\pi < 0.5$ 。

四 模型与变量

（一）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关注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行为的影响，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total_saving_{it} = \alpha_0 + \alpha_1 bargain_power_{it} + X_{it}\beta + \phi_c + \varphi_t + \varepsilon_{it} \quad (6)$$

在上式中， $total_saving_{it}$ 为家庭储蓄规模。 $bargain_power_{it}$ 为核心解释变量女性议价能力。 X_{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户主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以及宏观经济变量。 φ_t 为年份固定效应， ϕ_c 为城市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误差项。

（二）数据与变量

本文所使用数据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从研究范围看，CHFS覆盖教育与就业、资产与负债、收入与消费等多项社会热门议题，是一项跨学科的大型追踪调查。从研究代表性看，调查采用三阶段分层、与人口规模成比例（PPS）的抽样方式。最新一轮的调查样本覆盖了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据具有较高的全国代表性。下面对关键变量进行解释说明。

家庭储蓄规模表示为去除各项消费支出后的家庭净收入的对数^①。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还使用家庭储蓄率替代家庭储蓄规模^②。本文使用女性收入占女性及其配偶总收入的比重作为女性议价能力的代理变量，同时选取女性及其配偶的受教育年限差异作为女性议价能力的另一个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男女受教育程度差距不仅反映了男女潜在收入方面的差异，也反映了个人效能感和能力方面的差异（Seguino & Floro, 2003）。

控制变量包括户主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户主特征变量包括户主年龄、年龄平方项、性别（女性=1，男性=0）、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已婚=1，其他=0）、健康状况（非常好=1，好=2，一般=3，不好=4，非常不好=5）、户籍类型（农业户口=1，非农业户口=0）、对风险规避的态度（风险规避者=1，其他=0）；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规模、失业人口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拥有医疗保险人口比例、不健康人口比、家庭住房类型（自有=1，租赁/免费居住=0）、家庭总资产、家庭总收入；宏观经济发展水平采用所在社区的平均消费水平的对数衡量。

① 家庭储蓄规模通常为正值，但若家庭存在负储蓄，则对其绝对值取对数后再取其相反数。

② 家庭储蓄率 = 家庭储蓄规模 / 家庭总收入。

为避免缺失值以及异常值带来的偏差,本文采取以下方式对样本进行处理:第一,剔除处于已婚状态以外的个体样本;第二,剔除变量存在缺失值和异常值的样本;第三,删除户主年龄小于 18 岁,或大于 100 岁的家庭样本;第四,剔除总资产为负数的样本;第五,对以人民币表示的相关经济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第六,对年龄的平方项进行对数处理。经上述数据处理过程后,最终得到 5 期非平衡面板数据,其中 2011 年样本 3046 户、2013 年样本 10466 户、2015 年样本 12445 户、2017 年样本 19285 户、2019 年样本 15532 户,总样本量 60774 户。

本文给出了相关变量分年份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表 1 显示,已婚家庭中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收入低于男性。观察 2011-2019 年的变化有以下发现。首先,家庭中女性与其配偶的性别工资差距逐渐缩小,女性的收入比例由 2011 年的 30.7% 上升至 2019 年的 36.5%。这说明伴随着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以及近年来国家针对女性就业促进政策的实施,女性在经济社会中“半边天”的作用得以彰显,已婚女性的相对工资收入水平逐步提高。其次,家庭中丈夫与妻子之间受教育年限差异呈现缩小趋势,妻子与丈夫受教育年限差异由 2011 年的 0.923 年降低至 2019 年的 0.850 年。一定程度上说明近些年中国促进男女平等与妇女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逐步改善。最后,家庭平均储蓄规模也在近 10 年有轻微增幅。

表 1 分年份的各变量均值

变量名称	全样本	2011 年	2013 年	2015 年	2017 年	2019 年
家庭储蓄规模	10.381	9.947	10.220	10.393	10.513	10.401
家庭储蓄率	0.297	0.350	0.294	0.299	0.331	0.244
女性议价能力	0.355	0.307	0.319	0.320	0.364	0.365
受教育年限差异	-0.864	-0.923	-0.864	-0.804	-0.906	-0.850
户主年龄	52.023	46.061	49.956	47.400	54.425	55.309
户主性别	0.214	0.263	0.245	0.226	0.168	0.233
户主受教育年限	10.326	10.221	10.586	10.345	10.261	10.237
户主婚姻状况	0.988	0.993	0.990	0.983	0.988	0.989
户主健康情况	2.583	2.276	3.087	2.444	2.456	2.576
户主户籍类型	0.378	0.429	0.298	0.447	0.368	0.381
风险规避态度	0.410	0.374	0.396	0.402	0.418	0.446
家庭规模	3.394	3.596	3.414	3.717	3.274	3.230
失业人口比	0.263	0.051	0.053	0.050	0.364	0.492
少儿抚养比	0.111	0.135	0.115	0.129	0.103	0.101
老年抚养比	0.169	0.067	0.128	0.060	0.216	0.245
拥有医疗保险人口比例	0.914	0.942	0.940	0.884	0.906	0.924

续表

变量名称	全样本	2011年	2013年	2015年	2017年	2019年
不健康人口比	0.140	0.059	0.316	0.073	0.113	0.126
家庭住房类型	0.839	0.857	0.811	0.838	0.845	0.846
家庭总资产	13.089	12.398	12.980	13.024	13.114	13.318
家庭总收入	11.137	10.638	11.003	11.038	11.242	11.273
同社区平均消费水平	11.056	10.375	10.907	10.991	11.059	11.340
丈夫受教育年限	10.533	10.421	10.829	10.620	10.425	10.422
妻子受教育年限	9.669	9.498	9.965	9.816	9.519	9.572
样本量	60774	3046	10466	12445	19285	15532

资料来源：根据2011-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计算得到。

五 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在基准回归中，本文通过逐步控制户主特征、家庭结构特征、家庭经济特征研究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的影响，共涉及4个子回归。表2第（1）~（4）列均表明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总体储蓄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且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女性议价能力每提高1个百分点，家庭总储蓄降低0.271%，说明女性议价能力的提高可以降低家庭储蓄规模。这是由于相比男性，女性更偏好家庭成员可以共享的物品消费，其支出具有外部性。当家庭资源受到约束时，家庭成员的支出偏好存在竞争。在女性议价能力更高的家庭，女性支出偏好可以得到满足，从而增加家庭教育、健康方面的投资（郝晶辉等，2021；Quisumbing & Maluccio，2003），降低家庭的总体储蓄规模。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家庭储蓄规模			
	(1)	(2)	(3)	(4)
女性议价能力	-0.266 *** (0.101)	-0.298 *** (0.098)	-0.330 *** (0.097)	-0.271 *** (0.071)
户主年龄		0.080 *** (0.014)	0.145 *** (0.018)	0.041 ** (0.016)
户主年龄平方项		-1.095 *** (0.360)	-2.800 *** (0.439)	-0.316 (0.385)

续表

	家庭储蓄规模			
	(1)	(2)	(3)	(4)
户主性别		0.081 (0.078)	0.059 (0.079)	-0.076 (0.065)
户主受教育年限		0.206 *** (0.009)	0.196 *** (0.009)	-0.043 *** (0.009)
户主婚姻状况		0.044 (0.264)	0.385 (0.272)	0.327 (0.229)
户主健康情况		-0.470 *** (0.031)	-0.223 *** (0.034)	-0.076 *** (0.025)
户主户籍类型		-0.502 *** (0.079)	-0.420 *** (0.080)	0.155 ** (0.069)
风险规避态度		-0.380 *** (0.062)	-0.337 *** (0.062)	0.264 *** (0.050)
家庭规模			0.241 *** (0.034)	0.434 *** (0.024)
失业人口比			-0.570 *** (0.106)	0.285 *** (0.096)
少儿抚养比			-2.113 *** (0.249)	-0.441 ** (0.197)
老年抚养比			-0.234 * (0.130)	0.342 *** (0.112)
拥有医疗保险人口比例			0.818 *** (0.151)	0.076 (0.107)
不健康人口比			-1.809 *** (0.146)	-0.993 *** (0.119)
家庭住房类型			0.522 *** (0.089)	0.779 *** (0.089)
家庭总资产				-0.499 *** (0.031)
家庭总收入				4.550 *** (0.049)
常数项	6.299 *** (0.036)	10.115 *** (2.068)	17.851 *** (2.420)	-36.521 *** (2.126)
宏观经济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60774	60774	60774	60774
R ²	0.145	0.163	0.171	0.424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表示在城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根据 2011 - 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 数据计算得到。

（二）内生性问题

已有文献通常将女性收入占夫妻收入的比重作为女性议价能力的代理变量，但其存在内生性问题。第一，传统的集体模型认为帕累托权重（或权力平衡）是家庭决策的外生因素。但实际上这种假定存在缺陷，因为帕累托权重又取决于家庭的选择向量（Basu, 2006）。第二，按照妻子收入比例这一指标，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收入为零意味着其在家庭的议价能力为零。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不工作是拥有更高议价能力的女性自我选择的结果（Doss, 2006）。为了缓解女性议价能力指标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尹志超和张诚（2019）的研究选取同社区其他家庭的女性议价能力均值作为女性议价能力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见表3。工具变量法（IV）中第一阶段F值大于10，说明模型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表3第（1）~（2）列汇报了IV估计结果：在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后，女性议价能力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均与基准回归一致。女性议价能力IV估计系数绝对值大于基准回归估计系数绝对值，说明基准回归低估了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规模的负效应。

表3 工具变量法：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规模影响的回归结果

	女性议价能力	家庭储蓄规模
	(1)	(2)
同社区女性议价能力均值	0.952 *** (0.008)	
女性议价能力		-1.157 *** (0.235)
户主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宏观经济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第一阶段F值	110.49	
样本量	60774	60774

注：***、**、*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表示在城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根据2011-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计算得到。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替换核心变量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根据已有文献结论，夫妻间

受教育年限差异也可以代表家庭内部的议价能力。因此，本文使用妻子与丈夫的受教育年限差异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①。妻子与丈夫的受教育年限差异越大表示妻子在家庭中的议价能力越高。表 4 第 (1) 列的结果表明，使用夫妻间受教育年限差异作为家庭中女性议价能力的代理变量时，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总储蓄规模仍然存在挤出效应，且回归系数在 1% 统计水平上显著。第二种稳健性检验方法是使用家庭储蓄率代替家庭总储蓄规模。如第 (2) 列结果显示：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率同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妻子收入比例每上升 1 个百分点，家庭储蓄率下降 0.011 个百分点。第三种稳健性检验方法是使用夫妻受教育年限差异和家庭储蓄率同时替换原有变量，结果显示夫妻受教育年限差异降低了家庭储蓄率水平。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表 4 稳健性检验：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影响的回归结果

	家庭储蓄规模	家庭储蓄率	家庭储蓄率
	(1)	(2)	(3)
女性议价能力		-0.011 *** (0.003)	
受教育年限差异	-0.064 *** (0.018)		-0.003 *** (0.001)
户主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宏观经济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36.418 *** (2.113)	-1.464 *** (0.100)	-1.463 *** (0.099)
样本量	60774	60774	60774
R ²	0.424	0.369	0.442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表示在城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根据 2011 - 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 数据计算得到。

(四) 异质性分析

本部分进一步研究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行为的异质性影响，并采用分组回归

① 妻子与丈夫的受教育年限差异 = 妻子受教育年限 - 丈夫受教育年限。

的方法从城乡（户籍为城市/农村）、区域（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高中/大学及以上）、家庭收入阶层（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四个方面分别探讨。

1. 按照城乡分类的异质性分析

中国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城镇与农村在性别观念、消费、储蓄理念等方面存在差异。表5的回归结果显示，城镇家庭的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规模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女性议价能力对农村家庭储蓄的挤出效应不显著。究其原因，一方面，城镇拥有更现代的城市文明和价值观念，家庭性别观念更开放；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家庭资源严重向男性倾斜导致女性权利缺失，且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较深，女性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思想根深蒂固（叶普万、贾慧咏，2010）。因此农村女性地位和经济表现与城镇女性差异较大。随着城镇化和逆城镇化进程加快，城乡的区域隔阂逐渐被打破。农村女性主体意识的增强将强化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规模的挤出效应。此外，由于近些年全国高储蓄率主要由城镇储蓄率拉动，本文也为降低城镇储蓄率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表5 分城乡：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规模影响的回归结果

	城镇	农村
	(1)	(2)
女性议价能力	-0.347 *** (0.078)	0.019 (0.172)
户主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宏观经济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37.424 *** (2.251)	-33.408 *** (5.987)
样本量	49566	11208
R ²	0.450	0.354

注：***、**、*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表示在城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根据2011-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计算得到。

2. 按照区域分类的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地区层面上存在经济发展水平、传统文化观念、消费储蓄习惯的差异，本

文将样本按照所在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地区分析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的异质性影响。表 6 结果显示仅在东部地区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其他三个地区女性议价能力对储蓄的影响为负，但均不显著。这是由于东部地区的文化观念以及经济发达程度使女性在家庭决策上有较强的话语权，较强的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的挤出效应更为明显。

表 6 分区域：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规模影响的回归结果

	东北	东部	中部	西部
	(1)	(2)	(3)	(4)
女性议价能力	-0.239 (0.312)	-0.402*** (0.117)	-0.081 (0.131)	-0.177 (0.136)
户主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宏观经济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42.025*** (7.148)	-30.828*** (2.532)	-43.409*** (4.707)	-43.676*** (3.446)
样本量	3952	30513	12980	13329
R ²	0.372	0.418	0.416	0.445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表示在城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根据 2011 - 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计算得到。

3. 按照受教育程度分类的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已婚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家庭储蓄行为，本文将家庭中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和大学及以上三类。表 7 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妻子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家庭中，女性议价能力对储蓄规模的影响不显著。但在妻子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家庭中，女性议价能力的储蓄挤出效应显著。这说明随着受教育年限逐渐增加，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规模的挤出效应逐渐增强。究其原因，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可以获得更多社会资源，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并更愿意接受两性平等的性别观念（王鹏、吴愈晓，2019）。由传统的“男尊女卑”到现代“两性平等”性别观念的转变会增加女性在家庭中占有的经济资源，从而有助于提高其在家庭决策中的话语权（薛琪薪、章志敏，2019）。话语权的提高可以强化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规模的负面影响。

表 7 分受教育程度：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规模影响的回归结果

	初中及以下	高中	大学及以上
	(1)	(2)	(3)
女性议价能力	-0.137 (0.096)	-0.274 * (0.145)	-0.624 ** (0.272)
户主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宏观经济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41.595 *** (3.032)	-37.907 *** (3.657)	-28.464 *** (6.217)
样本量	34504	19889	6381
R ²	0.457	0.442	0.496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表示在城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根据 2011 - 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计算得到。

4. 按照收入阶层分类的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家庭储蓄规模和家庭收入密不可分，不同收入阶层家庭的女性议价能力以及家庭储蓄决策存在差异。因此本文按照家庭总收入的 1/3、2/3 分位点分成低收入、中等收入以及高收入家庭。表 8 结果显示，女性议价能力仅对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储蓄规模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高收入家庭储蓄的挤出效应是低收入家庭的 1.30 倍；对中等收入阶层家庭的储蓄行为没有显著影响。高收入家庭拥有更多的经济自主权和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能力，也更支持非传统的性别观念（薛琪薪、章志敏，2019），因此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规模的挤出效应更强。女性议价能力对高收入水平家庭显著的挤出效应也说明提高女性议价能力的必要性。

表 8 分收入阶层：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规模影响的回归结果

	低收入	中等收入	高收入
	(1)	(2)	(3)
女性议价能力	-0.251 ** (0.118)	-0.248 (0.178)	-0.327 ** (0.135)
户主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续表

	低收入	中等收入	高收入
	(1)	(2)	(3)
家庭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宏观经济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32.512 *** (4.093)	-66.595 *** (4.843)	-16.311 *** (2.847)
样本量	20279	20252	20243
R ²	0.400	0.295	0.258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表示在城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根据 2011 - 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计算得到。

六 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规模的影响机制

已有研究认为女性被社会保障政策边缘化（Seguino & Floro, 2003）、收入较低、抵御风险能力差，因此女性更倾向于预防性储蓄。伴随着女性力量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得了更高质量的教育、掌握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并拥有更好的就业机会，预防性储蓄动机明显减弱。女性议价能力的提高对家庭的决策结构产生了冲击。本部分从教育支出、社会网络以及移动支付三个角度阐释女性议价能力的提高对家庭储蓄规模的挤出效应。

（一）增加教育支出

传统社会文化赋予女性角色“利他”的特性。基于家庭人力资本理论，女性更倾向于增加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换言之，妻子和丈夫的消费支出偏好存在明显差异：相比男性，女性更倾向于购买家庭公共品，如食品、教育；而男性则倾向于购买个人偏好产品，如烟、酒。在一些地区，女性的决策权和入学率存在正向关系（Hendrick & Marteleto, 2017；Luz & Agadjanian, 2015）。Quisumbing & Maluccio（2003）利用结婚时的人力资本和个人资产作为女性议价能力的代理变量，发现在孟加拉国和南非女性婚前资产的增加对家庭的教育支出有显著促进作用。在妻子控制收入（总收入或非劳动收入）的家庭，用于人力资本（家庭服务、保健和教育）以及休闲（娱乐和仪式）物品的家庭消费支出远高于由丈夫控制收入的家庭（Thomas, 1993）。易行健等

(2016) 在研究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决定因素时发现，女性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显著大于其配偶对教育支出的影响。Rangel (2006) 将延长赡养费权利作为巴西女性议价能力增加的外生因素，发现女性决策权会影响对子女教育的投资。李婧和许晨辰 (2020) 在研究家庭规划对储蓄的影响时发现，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育儿教育支出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均显著为负。因此，女性议价能力通过增加教育支出进而影响家庭储蓄规模。

表9为教育支出机制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当考虑了家庭教育支出后，女性议价能力每增加1个百分点，家庭储蓄规模降低0.205%，且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因此，家庭教育支出是女性议价能力影响家庭储蓄规模的机制之一。

表9 女性议价能力、教育支出与家庭储蓄规模

	家庭储蓄规模	教育支出	家庭储蓄规模
	(1)	(2)	(3)
女性议价能力	-0.271 *** (0.071)	0.328 *** (0.058)	-0.205 *** (0.073)
教育支出			-0.203 *** (0.007)
户主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宏观经济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36.521 *** (2.125)	-40.831 *** (3.039)	-44.812 *** (2.413)
样本量	60774	60774	60774
R ²	0.424	0.369	0.442

注：***、**、*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表示在城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根据2011-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计算得到。

(二) 强化社会网络

社会资本是促进互惠而协调行动的信任、规范和网络。社会资本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其强调了经济主体之间的参与、合作和信任在克服社会困境和生产社会福利最大化公共产品方面的重要性 (Christoforou, 2011)。性别社会网络的相关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自幼年时期开始就拥有不同的人际关系，成年后的社交网络也存在巨大差异

(胡新华等, 2020)。Addis & Joxhe (2017) 使用 1997 年和 2011 年意大利调查数据评估了性别和年龄在社会资本生命周期积累方面的差异。回归分析表明, 男性和女性在生命周期中的社会资本积累存在差异: 男性在各个年龄段都积累更多社会资本, 且受教育程度、劳动参与均能显著增加社会资本。此外, 1997 年至 2011 年男女社会资本的差异逐步缩小。同时意大利劳动力市场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持续上升。这些结构性变化增加了女性有偿工作的社会资本, 并使女性和男性的社会网络更加相似。在关于社会资本影响因素的研究中, 个人或家庭的客观特征, 如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龄、劳动参与以及主观因素如主观经济地位, 均对社会资本产生显著影响。换言之, 当女性议价能力上升时, 其掌握的资源会扩大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消除不确定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尤其在合同制度不健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预防性储蓄假说认为, 个体可以依靠亲密的朋友或亲戚形成的社会保险机制获得礼物交换和非正规借贷, 从而降低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因此, 个体所处的社会网络越广泛, 越能抵御不确定风险带来的负面冲击, 家庭预防性储蓄随之减少。相应地, 个体的社会网络越小, 则预防性储蓄规模越高。易行健等 (2012) 使用礼金支出作为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 发现发达的社会网络降低了家庭储蓄率, 该影响在低收入水平家庭最为显著。

因此, 为研究女性议价能力是否通过扩大社会网络影响家庭储蓄规模, 本文参考杨阳等 (2018) 研究方法, 使用红白喜事支出和收入之和的对数作为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进行机制分析。表 10 第 (2) 列显示, 提高女性议价能力可以扩大社会网络。第 (3) 列的估计结果表明, 当考虑了社会网络后, 女性议价能力每增加 1 个百分点, 家庭储蓄规模降低 0.272%, 且回归系数在 1% 统计水平上显著。因此, 社会网络也是女性议价能力影响家庭储蓄规模的机制之一。

表 10 女性议价能力、社会网络与家庭储蓄规模

	家庭储蓄规模	社会网络	家庭储蓄规模
	(1)	(2)	(3)
女性议价能力	-0.271 *** (0.071)	0.021 * (0.012)	-0.272 *** (0.071)
社会网络			-0.055 *** (0.006)
户主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续表

	家庭储蓄规模	社会网络	家庭储蓄规模
	(1)	(2)	(3)
宏观经济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36.521 *** (2.125)	-12.701 *** (1.460)	-37.545 *** (2.144)
样本量	60774	60774	60774
R ²	0.424	0.244	0.426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表示在城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根据 2011 - 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计算得到。

（三）提高移动支付使用概率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以及移动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快速发展，金融科技在中国迅速崛起。在此基础上，支付方式也由传统现金支付向移动虚拟货币支付演进。移动支付安全便捷、交易成本低等特性会诱导消费者丧失自制力，产生货币幻觉。货币幻觉是指相较于使用现金支付的消费者，使用移动支付方式的消费者更不易感受到货币的流失，从而使消费者享受当期消费、降低当期储蓄。与此同时，随着数字金融的深入发展，消费者浏览过的信息和交易情况可以作为一种宝贵的数字资源。通过对其进行探索和研究可以了解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并对其消费行为进行预测，从而在消费者感兴趣的领域进行有针对性的产品推送。这也会诱使消费者丧失自制力，增加当期消费。综上所述，移动支付对于家庭消费储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安全便捷的支付方式解决了现金支付交易成本高的弊端，从而促进消费、降低储蓄；二是支付平台的算法实现了精准推送，增强了消费者的体验感。尤其如蚂蚁花呗、京东白条等消费信贷产品的出现，超前消费、非理性消费的行为日益增多导致储蓄减少。电子商务兴起后，女性的购物热情逐渐从线下转移至线上，其中场景化的移动支付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刘向东和张舒（2019）的研究说明了在支付方式由现金支付变为移动支付后，女性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发生显著改变：消费金额增加 24.47%，消费频率提升 15.62%；男性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无明显变化。因此，当女性地位提高、在家庭中拥有更多的独立决策权时，女性议价能力可以通过增加移动支付影响家庭储蓄。

鉴于仅有 2017 年和 2019 年 CHFS 问卷询问了是否使用支付宝、微信、京东钱包、手机银行等支付方式，参考尹志超等（2022）关于移动支付的定义方式，本文使用

2017 年和 2019 年的面板数据分析移动支付的机制作用。表 11 第 (2) 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女性议价能力的提高增加了使用移动支付的概率，且在 1% 统计水平上显著。从第 (3) 列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将移动支付纳入模型后，女性议价能力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家庭储蓄规模降低 0.276%，且回归系数仍在 1% 统计水平上显著。因此，女性议价能力提高会通过更多地使用移动支付影响家庭储蓄规模。

表 11 女性议价能力、移动支付与家庭储蓄规模

	家庭储蓄规模	移动支付	家庭储蓄规模
	(1)	(2)	(3)
女性议价能力	-0.298 *** (0.094)	0.032 *** (0.008)	-0.276 *** (0.093)
移动支付			-0.707 *** (0.072)
户主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宏观经济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41.765 *** (3.922)	0.624 *** (0.243)	-41.128 *** (3.809)
样本量	34716	34716	34716
R ²	0.410	0.449	0.412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表示在城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根据 2011 - 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 数据计算得到。

七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结论

增强女性权能对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在中国高储蓄率、消费需求不足的背景下，以家庭内部权力不平等为切入点，基于 CHFS 2011 - 2019 五期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女性议价能力提升对家庭储蓄规模的影响。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 (IV) 解决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同时从教育支出、社会网络、移动支付三个角度分析了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规模的影响机制，丰富了家庭储蓄的相关研究。本文主要结论如

下：女性议价能力的提升可以显著降低家庭的总体储蓄规模；女性议价能力每提高1个百分点，家庭储蓄规模降低0.271%。改变女性议价能力等核心变量定义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女性议价能力的家庭储蓄挤出效应在城乡、区域、妻子受教育程度、收入阶层间具有明显差异。女性议价能力对城市家庭、东部地区家庭的储蓄挤出效应显著；对妻子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家庭储蓄的挤出效应显著；相比于中等收入家庭，女性议价能力显著减少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储蓄规模。进一步分析显示，女性议价能力可以通过增加教育支出、强化社会网络以及提高移动支付使用概率对家庭储蓄产生负向影响。

（二）建议

女性议价能力的提高有利于通过增加家庭教育支出、强化社会网络以及提高移动支付使用概率进而降低家庭储蓄规模。这意味着在社会再分配中，将资源向女性倾斜不仅能够提高家庭福祉、推动家庭消费，更重要的是发挥了女性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使资源利用更有效率。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进一步提高女性地位，发挥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独特作用。提高女性地位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而就业和教育是女性参与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通过增加女性收入提升家庭和社会地位，为女性提供更为平等的就业机会，妥善解决女性面临的生育和就业难题。与此同时，夯实男女同工同酬的制度基础，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努力减少和消除对女性的就业歧视。另一方面，提高受教育程度可以强化人力资本，改善女性劳动者的劳动力市场地位。让女性享有同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权，既是女性得以发展的根本前提，也是促进性别平等的重要保障。其次，女性在经济发展中的力量不容小觑，政府相关部门在制定刺激需求的公共政策时要关注性别差异，多措并举让女性能够平等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形成提高女性地位和经济发展双向促进的良性循环。

（三）不足与展望

受数据限制，本文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虽然本文使用的女性议价能力代理变量在国内外相关文献中被广泛使用，但仍然无法全面反映女性的权力状况。女性议价能力是一个多侧面、多维度的变量，未来在度量女性议价能力方面可以进一步探索。第二，在研究女性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规模的影响机制时，本文仅从教育支出、社会网络以及移动支付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索性的分析，并不能涵盖全部作用机制。但总体来看，为女性赋权可以降低家庭储蓄规模，这对提高女性地位、改变中国高储蓄率现状均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陈彦斌、邱哲圣 (2011), 《高房价如何影响居民储蓄率和财产不平等》, 《经济研究》第 10 期, 第 25 - 38 页。
- 陈银娥、苏志庆、何雅菲 (2015), 《微型金融对女性减贫的影响：基于金融赋权视角的分析》, 《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第 30 - 38 页。
- 甘犁、赵乃宝、孙永智 (2018), 《收入不平等、流动性约束与中国家庭储蓄率》, 《经济研究》第 12 期, 第 34 - 50 页。
- 郝晶辉、王菲、黄佳琦 (2021), 《男性外出务工、女性赋权与家庭成员蛋白质摄入——来自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证据》, 《中国农村经济》第 8 期, 第 125 - 144 页。
- 胡新华、喻毅、韩炜 (2020), 《谁更能建构高质量的社会网络？——创业者先前经验影响社会网络构建的作用研究》, 《研究与发展管理》第 5 期, 第 126 - 138 页。
- 李婧、许晨辰 (2020), 《家庭规划对储蓄的影响：“生命周期”效应还是“预防性储蓄”效应?》, 《经济学动态》第 8 期, 第 20 - 36 页。
- 刘向东、张舒 (2019), 《移动支付方式与异质性消费者线下消费行为》, 《中国流通经济》第 12 期, 第 3 - 15 页。
- 宁满秀、罗晴 (2015), 《夫妻议价能力差异对农村老年父母照料行为的影响——基于 CHARLS 数据的实证研究》,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社科版)》第 2 期, 第 11 - 20 页。
- 齐良书 (2005), 《议价能力变化对家务劳动时间配置的影响——来自中国双收入家庭的经验证据》, 《经济研究》第 9 期, 第 78 - 90 页。
- 王鹏、吴愈晓 (2019), 《社会经济地位、性别不平等与性别角色观念》, 《社会学评论》第 2 期, 第 55 - 70 页。
- 王群勇、赵玮 (2019), 《美貌与权利——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南开经济研究》第 6 期, 第 181 - 198 页。
- 徐安琪 (2005), 《夫妻权力和妇女家庭地位的评价指标：反思与检讨》, 《社会学研究》第 4 期, 第 134 - 152 页。
- 薛琪薪、章志敏 (2019), 《城乡人口流动与家庭性别意识的现代化与平权化——基于对上海、浙江和福建农村家庭的调查数据》, 《南方人口》第 4 期, 第 1 - 14 页。

- 杨阳、蒋佳伶、尹志超、宋晓巍 (2018), 《社会网络与京津冀家庭消费——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2013)”的实证研究》, 《经济与管理研究》第 10 期, 第 81 - 92 页。
- 叶普万、贾慧咏 (2010), 《我国农村妇女贫困的现状、原因及解决对策》, 《理论学刊》第 9 期, 第 61 - 64 页。
- 易行健、张波、杨汝岱、杨碧云 (2012), 《家庭社会网络与农户储蓄行为：基于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 《管理世界》第 5 期, 第 43 - 51 页。
- 易行健、张家为、杨碧云 (2016), 《家庭教育支出决定因素分析——来自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南方人口》第 3 期, 第 21 - 35 页。
- 殷浩栋、毋亚男、汪三贵、王瑜、王姮 (2018), 《“母凭子贵”：子女性别对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家庭决策权的影响》, 《中国农村经济》第 1 期, 第 108 - 123 页。
- 尹志超、吴子硕、蒋佳伶 (2022), 《移动支付对中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金融研究》第 9 期, 第 57 - 74 页。
- 尹志超、张诚 (2019), 《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经济研究》第 4 期, 第 165 - 181 页。
- Addis, Elisabetta & Majlinda Joxhe (2017). Gender Gaps in Social Capital: A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Evidence from Italy. *Feminist Economics*, 23 (2), 146 - 171.
- Apps, Patricia & Ray Rees (2001). Household Saving and Full Consumption over the Life Cycle. *IZA Discussion*, No. 280.
- Basu, Kaushik (2006). Gender and Say: A Model of Household Behaviour with Endogenously Determined Balance of Power. *The Economic Journal*, 116 (511), 558 - 580.
- Becker, Gary (1981).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hagowalia, Priya, Purnima Menon, Agnes Quisumbing & Vidhya Soundararajan (2010). Unpacking the Links between Women's Empowerment and Child Nutrition Evidence Using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Data from Banglades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gricultural and Applied Economics Association, Denver, Colorado, July 25 - 27.
- Booyesen, Frederik & Sevias Guvuriro (2021). Gender Differences in Intra-Household Financial Decision-Making: An Application of Coarsened Exact Matching. *Journal of Risk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14 (10), 469.
- Börsch-Supan, Axel & Annamaria Lusardi (2003). Saving: A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In Axel Börsch-Supan (ed.), *Life-Cycle Savings and Public Policy: A Cross-National Study*

- of Six Countrie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 1 – 31.
- Browning, Martin (1995). Saving and the Intra-Househo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Ricerche Economiche*, 49 (3), 277 – 292.
- Browning, Martin (2000). The Saving Behaviour of a Two-Person Household.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02 (2), 235 – 251.
- Browning, Martin & Annamaria Lusardi (1996). Household Saving: Micro Theories and Micro Fact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4 (4), 1797 – 1855.
- Calvi, Rossella (2020). Why Are Older Women Missing in India? The Age Profile of Bargaining Power and Pover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8 (7), 2453 – 2501.
- Christoforou, Asimina (2011). Social Capital across European Countries: Individual and Aggregate Determinants of Group Membership.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70 (3), 699 – 728.
- Cohen, Philip (1998). Replacing Housework in the Service Economy: Gender, Class, and Race-Ethnicity in Service Spending. *Gender & Society*, 12 (2), 219 – 231.
- Doepke, Matthias & Michèle Tertilt (2019). Does Female Empowerment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4 (4), 309 – 343.
- Doss, Cheryl (2006). The Effects of Intrahousehold Property Ownership on Expenditure Patterns in Ghana.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15 (1), 149 – 180.
- Esping-Andersen, Gøsta & Christian Schmitt (2020). Multi-Dimensional Couple Bargaining and Housework Allocation. *Acta Sociologica*, 63 (1), 3 – 22.
- Gibson, John, Trinh Le & Grant Scobie (2006). Household Bargaining over Wealth and the Adequacy of Women's Retirement Incomes in New Zealand. *Feminist Economics*, 12 (1 – 2), 221 – 246.
- Gourinchas, Pierre-Olivier & Jonathan Parker (2002). Consumption over the Life Cycle. *Econometrica*, 70 (1), 47 – 89.
- Hendrick, Emily & Letícia Marteleto (2017). Maternal Household Decision-Making Autonomy and Adolescent Education in Honduras.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36 (3), 415 – 439.
- Keynes, Maynard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 Kritz, Mary & Paulina Makinwa-Adebusoye (1999). Determinants of Women's Decision-Making

- Authority in Nigeria: The Ethnic Dimension. *Sociological Forum*, 14 (3), 399 – 424.
- Li, Lixing & Xiaoyu Wu (2011). Gender of Children, Bargaining Power, and Intrahousehold Resource Alloc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46 (2), 295 – 316.
- Lusardi, Annamaria (2008). Household Saving Behavior: The Role of Financial Literacy, Information, and Financial Education Program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3824.
- Luz, Luciana & Victor Agadjanian (2015). Women's Decision-Making Autonomy and Children's Schooling in Rural Mozambique. *Demographic Research*, 32, 775 – 796.
- Quisumbing, Agnes & John Maluccio (2003). Resources at Marriage and Intrahousehold 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Bangladesh, Ethiopia, Indonesia, and South Africa.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5 (3), 283 – 327.
- Rangel, Marcos (2006). Alimony Rights and Intrahousehold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Evidence from Brazil. *The Economic Journal*, 116 (513), 627 – 658.
- Seguino, Stephanie & Maria Floro (2003). Does Gender Have Any Effect on Aggregate Sav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17 (2), 147 – 166.
- Skinner, Jonathan (1988). Risky Income, Life-Cycle Consumption, and Precautionary Saving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2), 237 – 255.
- Stotsky, Janet Gale (2006). Gender and Its Relevance to Macroeconomic Policy: A Survey. *IMF Working Paper*, No. 2006/233.
- Thomas, Duncan (1993).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within the Household.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9, 109 – 135.
- Wei, Shang-jin & Xiaobo Zhang (2011). 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 Savings Rates in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9 (3), 511 – 564.
- Xiao, Jing Jian & Franziska Noring (1994). Perceived Saving Motives and Hierarchical Financial Needs. *Journal of Financial Counseling and Planning*, 5, 25 – 44.
- Yang, Dennis Tao, Junsen Zhang & Shaojie Zhou (2011). Why Are Saving Rates So High in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 16771.

Women's Bargaining Power and Household Saving Behavior: A Research Based on the CHFS Data

Zou Wei & Yin Wenx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A high saving rate is a prominent feature of China's economy. From 2010 to 2020, China's national saving rate showed an apparent downward trend, while women's bargaining power showed an upward trend.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s bargaining power and household savings. It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the national saving ra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ower distribution within the family. The empirical research was conducted using five waves of CHFS from 2011 to 2019.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female bargaining power has a significant crowding-out effect on household savings.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include education expenditure, social networks, and mobile payment.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women's bargaining power in household saving decision-making. It provides a micro mechanism for discussing the change in the national savings rate. It supports for formulating public policies focusing on inequality within families and establish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to expand domestic demand.

Keywords: inequality within the family, women's bargaining power, household saving behavior

JEL Classification: J12, E2, J18, J16

(责任编辑: 马 超)